

神界的黄昏

時代演變的模型
天才歌德與不朽 《浮士德》
異邦之鳥

季羨林 周一良 張芝聯
主編

遼寧大學出版社

**天才歌德与不朽《浮士德》
——欧洲精神发展历程**

邵伟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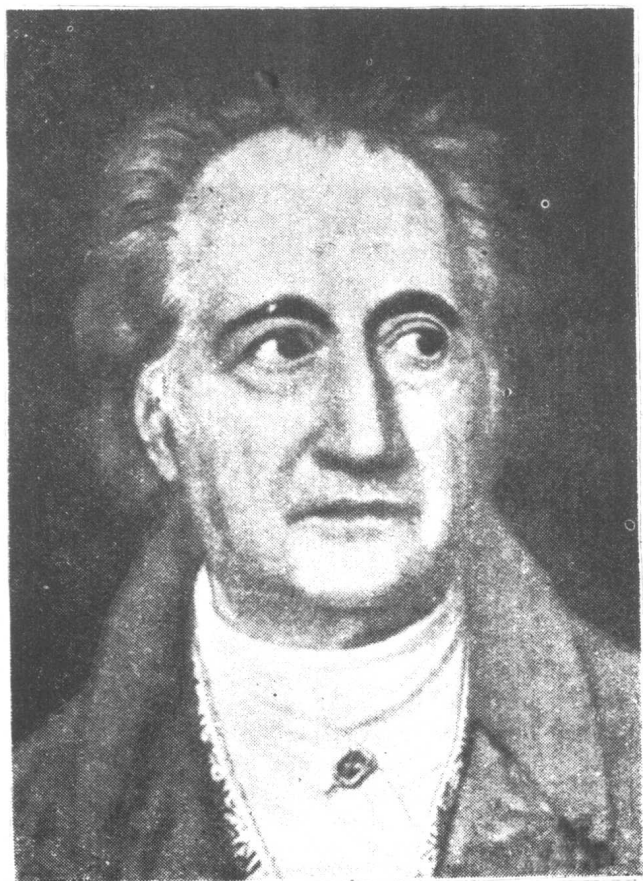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沈阳

5050/0803

上 篇

天才歌德



目 录

上 篇 天才歌德

一、起伏的求学时代 (1749—1771)

故家和少年.....	1
莱比锡的岁月.....	9
法兰克福的危机	16
期特拉斯堡的大好春光	19

二、狂飙突进运动 (1771—1775)

三、魏玛宫廷生活 (1775—1797)

努力实践与委曲求全	53
意大利之旅	72
希望与怀疑	78

四、与席勒结交的十年 (1794—1805)

五、拿破仑时期 (1805—1812)

生活与创作的危机	96
同拿破仑会晤前后.....	100

六、安定和辉煌的最后二十年 (1813—1832)

神游波斯.....	114
-----------	-----

世界公民——宁静最后十年·····	127
不朽的精神离开了躯体·····	156

下 篇 不朽《浮士德》

七、简论及由来

简论·····	162
歌德《浮士德》的由来·····	165

八、剧情概要

剧情综述·····	171
分幕场简介·····	176

九、辩证法与“两结合”

《浮士德》中的辩证法·····	208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211

十、不朽的浮士德精神

附录：西方评论摘要

后 记

一起伏的求学时代 (1749—1771)

一个人在青春所企望的，到晚年便得到丰收（德国古谚）。

——歌德：《诗与真》第二部卷首语

故家和少年

“17⁴⁹年8月28日中午，时钟敲了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降生了”。歌德在他那部杰出的自传《诗与真》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据当时请来的大夫森肯贝格说，歌德出生时是难产，费了不少事才被救活。婴儿歌德在第二天受洗时，起了他教父也是外祖父特克斯托尔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难产的婴儿日后竟成了位旷世奇才，伟大的世界诗人、思想家和学者。

歌德的祖父母是图林根人，是手工业者的后代。祖父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歌德原是曼斯菲尔尔德郊区阿特恩的裁缝，经过多年漫游，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娶妻之后在此地开了一家名为

“柳庭”的旅店。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的儿子约翰·卡斯帕尔·歌德独自继承了一份殷实的家产，因而得以攻读法律，并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游学，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他做过律师，并在帝国政府、雷根斯堡议会以及维也纳帝国枢密院任过职，1741年返回故乡法兰克福时，很想在市政府里谋得一个适当的职位，但是没有成功。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于1742年买了一个皇家顾问的头衔。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他虽然可以同城里最有名望的市民平起平坐，但却永远也不能谋取地方上的公职了。他于是只能靠食利为生，赋闲在家，致力于个人的研究与爱好。对此，他的内心是矛盾和苦闷的。1748年，他同法兰克福市长约翰·沃尔夫冈·特克斯托尔的女儿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结婚。夫妇俩共生了六个孩子，但活下来的只有约翰·沃尔夫冈和比他小一岁的妹妹科内莉亚。

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的全称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他童年时是个帝国直辖市，一向是皇帝加冕的地方，也是商业和交通中心。虽然人口微不足道，至多只有三万人，但是同当时的罗马、巴黎、伦敦或维也纳相比，当一个法兰克福市民还是很体面的。环绕着老市政厅，即“罗马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即在此举行），环绕着萨尔宫和大伽蓝布满了街巷，那里居住着富裕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自德意志各地的行商，以及来自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商人也时常光顾这个南北德意志商品的集散地。然而法兰克福市的封建贵族势力非常顽固，他们从经济到政治仍然严酷地压迫和剥削着广大的平民阶层。歌德十分重视他的故乡城市，因为那是他长身体和智力的少年时期所居住的地方。在《诗与真》的前几章里，歌德以史诗般的广度为这

座以其市民的勤劳和丰富多采的习俗而著称的古老的商业城市，勾画出一幅幅逼真的图画，描绘了它的大街小巷、水井、修道院和教堂。他满怀柔情地描述了那条上下都很引人入胜的美丽的河流，即美因河，也描述了居民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们的活动、节日和娱乐。幼年的歌德喜欢在大教堂周围或罗马山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消磨时光，他心里始终保存着对罗马山广场美好的回忆。

小沃尔夫冈属于特权家族。他家的房子有一个美妙悦耳的名字，叫做三把七弦琴，古老宽敞，座落在大鹿沟街，距罗马山广场才几百步远。透过他家的窗户，小歌德可以尽情眺望这座城市的种种美景。小歌德过着一种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生活。他周围的人们很快发现这个少年天分很高。他的刻板的、吹毛求疵的父亲决定自任家庭教师，着手把当时的基础知识教给孩子们。但效果如何却很难说了。歌德在《诗与真》里回忆道：我理解、消化和吸收得都快，不久父亲和别的老师能够给我上的课就不够我学的了，当然我还没有精通什么。我不喜欢语法，因为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的法则；我觉得规则是可笑的，因为那么多例外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它们，所有这些例外我都必须重新专门学习。小歌德很快地学会了读和写，《鲁滨逊漂流记》和J·G·施纳贝尔的小说《弗尔森堡岛》，同十六世纪古老的德意志通俗小说一样把他迷住了，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又在他父亲收藏丰富的书斋里读到了克洛普施托克、哈格多恩、哈勒特、哈勒尔、莱辛、扎哈里亚的著作，最后还读了百科全书类著作，如贝尔的名著《历史和批判词典》。而他外祖父特克斯托尔的住所也是小歌德时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获得了城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初印象，在脑海

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他的对人对己都是铁面无情的父亲相反，小歌德的母亲天性活泼快乐，正好同她丈夫十分注重理智的个性构成平衡。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生歌德的时候才十八岁，而小歌德的父亲已快四十岁了。她对孩子们往往更亲近。儿子和父亲之间多次严重的冲突之所以能够避免，恐怕得归功于她的调解能力和善解人意。后来歌德将自己气质中诗的因素归之于母亲“喜欢编造故事”的才能。歌德在回忆中喜欢突出他母亲的乐天性格。1782年歌德的父亲去世后，歌德母亲还在法兰克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歌德平时在谈起他对母亲的爱来总是不知疲倦，但在他离开故乡之后却总共只去看望过她四次。

歌德少年时代最知心的人就是他的妹妹科内莉亚了。歌德在《诗与真》中回忆道：“她只比我小一岁，自从我懂事以来她就跟我一起生活，因此同我感情最亲密……，小时候兄妹两人玩耍、学习、成长以及所受的教育都是完全一样的，以致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双胞胎，随着身体的发育和道德观念的形成，我们中间仍旧保持这种共同生活，这种相互依赖”。但科内莉亚却不具备歌德那种天赋，可以通过自发的决断或诗的创作来不断挣脱内心的疑虑。她落落寡欢，内心压抑，几乎每一次感情冲突都会在她的心里引起极度紧张。后来与歌德的一位朋友、法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施洛塞尔结婚，之后不久即在忧郁中去世，只活了二十七岁。

在歌德的少年时期，有三件大事对他影响很大，或者说，对歌德的精神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一是1755年11月1日的里斯本大地震。这次地震是作

为18世纪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而载入史册的。歌德晚年写《诗与真》时，虽然总想尽量削弱那些揪人心弦的经历的影响，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桩异常的世界大事是如何第一次深深震撼了他平静的心境”。

“各种征兆在地震发生之前已在广大地区出现了，比地震消息传得更快；许多地方感到了轻微的震动，发现许多泉水，特别是那些有疗效的泉水突然反常地中断了。发生地震的消息迅速传开，先是笼统的，接着又加上许多吓人的具体细节，影响更为巨大。于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少不了要沉思冥想，哲学家少不了会找出一些道理来安慰人，而神职人员则少不了以惩戒来进行说教。一时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次地震的波及面很广，四面八方都有消息传来，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大家由于外国的灾难而忐忑不安的心情，现在因为担心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而变得更加惶恐了。恐怖之魔恐怕还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如此猛烈地施展过它那可怕的淫威。

这孩子（当然指少年歌德自己——笔者）对所有这些不幸事情不免会一听再听，受了不少惊吓。作为天地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的上帝，尽管（小歌德）在听人空讲信条的第一条时曾经觉得他是那样的贤明和仁慈，现在却让好人和坏人一同毁灭，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慈父的样子。幼小的心灵想摆脱这种印象，可是怎么也做不到。智者和《圣经》学者对于如何看待这种奇异现象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要让孩子做到这一点就更加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六岁的小歌德在里斯本地震之后，就开始对上帝的仁慈有所怀疑了。

二是175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的七年战争。这

场战争以普鲁士、英国为一方，奥地利、俄国、法国为另一方，目的在于争夺中欧的霸权，经过了七年，至1763年结束。结果是普鲁士对奥地利取得胜利，从奥手中取得了西里西亚。这场战争使法兰克福人激动起来，他们分成了“弗利茨派”即支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和“反弗利茨派”，即反对国王的立场。歌德的外祖父特克斯托尔是亲奥地利的，而歌德的父亲则倾向于普鲁士。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使彼此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就导致家庭内部的公开决裂。少年歌德原本对政治问题不甚关心，但是他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本人很崇拜，于是就站在父亲这一边，用他《诗与真》里的话说：“于是我也倾向普鲁士，或者确切点说，倾向于弗利茨国王了，因为这与我们的普鲁士人休戚相关呀”。但是在《诗与真》里歌德也不掩饰他后来对波茨坦宫廷的蔑视。在“弗利茨”派后面确实隐藏着一种对民族的兴盛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理想的模糊渴望：期望出现社会解放者，即“德意志英雄”，这一思想在那些日子里成了这个十来岁少年的主导思想，而在他一生中，这种思想又以不同形式和诗的形象不断出现，从《葛兹》直到《浮士德》。歌德在《诗与真》里写道：“我耳闻目睹了多少家庭由于破产，离婚，女儿被诱拐，凶杀，家中被盗，投毒而毁灭，或在垂死挣扎！……我作为市长的外孙，很清楚这样一个共和国内部缺点之所在。特别是孩子们，只要他们对一向绝对崇拜的东西有了一点疑心，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并且去刨根问底……。”这种思想和情绪，促成他后来独立地、批判地去探讨周围的世界。

三是法军对法兰克福的占领以及法军少尉弗朗索瓦·德·特朗伯爵寄住歌德家。1759年1月，法兰克福遭到奥

地利盟友法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并被占领，因此这座城市也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影响。法国市政管理当局的一位负责官员、国王的副官托朗伯爵寄住在歌德家，前后差不多两年半之久，这件事不仅使歌德家免除战乱的浩劫，而且给少年歌德的成长以极好的影响。托朗伯爵是位很有教养的人，九岁的歌德在他身上看到了新英雄的形象，因为他代表了伟大的法国文化。这位官员虽然对房东没有多大好感，但对房东的儿子小歌德却和蔼可亲，情谊深厚。歌德同他交往的时候已经很懂事了。从九岁到十一岁，歌德从这位虽是军官但极爱艺术的法国伯爵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受到了熏陶。他不仅看到了托朗收购和收藏的许多绘画作品，而且亲眼目睹了被托朗请到家中的画家们亲手作画。法军占领期间，有个法国剧团来法兰克福演出，小歌德有机会多次去看戏，而且还直接同演员们接触。晚年的歌德在《诗与真》里对这位托朗伯爵作了满怀敬意的描绘，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大概在法军占领法兰克福的年月里，小歌德就开始练习诗歌创作了。早在1757年他七岁时，他就呈献给他的外祖父母两位老人一首押韵的新年祝福诗，结尾的两句是这样的：

今天你们接受的都是处女作，
而后笔端的功夫将更趋成熟。

这个预言当时已开始实现。自1759年后，十岁左右的歌德就毫不费劲地写了大量的诗，其中一部分是与他的同龄人比赛时写的。在十三岁生日那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

四开本的诗集呈献给了父亲。可惜这些习作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只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地狱之行的诗意随想》的几个片断和一部以《圣经》为内容的用巴罗克^①戏剧风格写的剧本残稿，在后来焚烧时得以幸免。

少年歌德在读书方面一直是很勤奋的，除了阅读大量的作品外，他还学了不少种语言，除了古代语言拉丁文外，还学了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后来又学了希伯来语。自然，少年时期的歌德所受的宗教教育也是严格的。除了参加礼拜之外，要天天读《圣经》，即《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虽然歌德后来脱离了正统的基督教，但年迈时歌德还承认，他大部分的智力修养仍应归功于《圣经》。

存在决定意识。小歌德所过的那种体面的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生活，必然也留给他一些阶级影响，即打下不可避免的阶级烙印，中了一些德国资产阶级的毒。用歌德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道德病”，即“那种从德意志的苦难中产生出来的想为贵族政治辩解的因素，那种极力想模仿贵族，接近贵族和想在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结构中，在贵族生活习惯中寻求范例的倾向”。小歌德曾经可笑和虚荣地把自己出身低微的祖父虚构为贵族。后来则又表现为自命不凡，追求时髦和夸夸其谈。成年后歌德世界观和性格方面的种种矛盾和两面性，都可以从他童年、少年时期所过的生活，所受的教育中找到最初的根由。

少年歌德不喜欢法学，他想学习美术和语言学，但他的刻板的父亲却希望儿子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律师，要他

① 巴罗克是17世纪意大利的一种艺术风格，当时在欧洲影响很大。它一反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严肃、含蓄、平衡，而倾向于豪华的浮夸。

去莱比锡学习。小歌德的愿望和请求是无济于事的，决定一切的是父亲。1765年9月底，歌德刚满十六岁，就和书商弗莱舍尔一同启程，前往普雷塞河畔的莱比锡城了。

莱比锡的岁月

1765年10月3日，十六岁的歌德来到莱比锡大学，这是他父亲的母校。他父亲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好好学习法律，在莱比锡大学或者另外一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然后走上高级行政法学家的仕途。

青年歌德怀着“一个囚犯挣脱了锁链”的心情，即挣脱了同父亲在一起时感到的拘束，来到莱比锡，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普雷塞河畔的莱比锡城，同讲求实际的法兰克福截然不同：除了博览会上的国际贸易外，科学和艺术都很繁荣，处处散发着“洛可可”精神，给青年歌德这位来自狭隘的帝国直辖市的显贵市民之子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所谓“洛可可”，是十八世纪法国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所崇尚的，以纤细、轻巧、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为其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影响遍及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种种新的潮流使他如痴若迷，歌德在莱比锡还成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文艺爱好者。

年轻的歌德到达莱比锡时适逢博览会期间。后来歌德在《诗与真》里回忆道：“我兴致勃勃地游遍了市场和商店；最引我注目的是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东方国家居民。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但主要是希腊人，我很喜欢他们的堂堂风采和庄重服饰……莱比锡决不会使访问者去忆古忆旧；这是一个新的，刚刚过去的，显示了贸易活动、富裕和财富

的时代，而我们就通过这些标志看到了这个时代。”当了三个星期的大学生后，歌德兴奋地给家里写信：“我在这儿颇出风头！——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招摇的程度。我也不想这样。——我要有点办法才能对这种繁忙生活应付自如。这阵子聚会、音乐会、喜剧、请客、晚宴、乘车旅行等活动真不少。哈，真有意思，好是好，但也真费钱。……”

生性敏感的青年歌德一到了这个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就像大多数宽绰的年轻人一样，身心几乎立刻改变了。他淘汰了从家里带来的过时服装，“新潮”了起来，染上了逍遥放纵的恶习，经常在酒店和剧场里无谓地消磨时光，活脱脱一个纨绔子弟。一年以后，他一个旧时的朋友在给别人的信中这样描绘他：“歌德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带着凌人的骄气，你看他那副样子叫人生气，又叫人忍不住要发笑。我从不曾看过一个人变得像他这样快。他现在和从前判若两人了。他的骄矜自恃的派头以及一切的举止，都令人难以容忍，令人生厌，他穿一件古怪的衣服以出风头，全校学生都在议论他，指责他，而他满不在乎，还自以为得意！”

显然，此时的歌德是决不会对父亲指定的法学感兴趣的，他迷上了美术，丢开书本去学画画和雕刻。

好在初到莱比锡时的兴奋和放纵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初的兴奋状态过去之后，歌德开始感到失望，不仅是法学课程，而且就连人文学科也不能持久地吸引住歌德。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去听当时闻名全国的诗人格勒特的课，可是这位诗人不仅讲课哭腔哭调，而且对当时年轻的天才，无论是克洛普施托克，还是维兰德或者拉辛，连提都不提，因而失去了这位学生对他的尊敬，只能使歌德对当时文化和

文学的现状更加怀疑。而1740年之前曾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的高特舍特，这位莱比锡大学教授，此时也变得好哗众取宠，已经成了公众嘲笑的对象。歌德和他的朋友施洛塞尔于1766年4月去访问过年迈的高特舍特，结果印象并不佳，反而加深了歌德对当时文学界的怀疑和不满。尽管年轻的歌德勤奋攻读，但实际上他丝毫也不能适应当时学校的教学环境。他不仅对许多教授只是教给他们书本知识，例如法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不满，而且，最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他们的陈腐观点。

幸好，在歌德彷徨犹豫之际，他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欧根的秘书约翰·格奥尔格·施洛塞尔来到莱比锡，他是英国启蒙运动派的一个信徒，为人正直诚实，是歌德的好友，后来在1773年娶了歌德的妹妹科内莉亚。法兰克福的朋友J·A·霍恩于1766年复活节也来到莱比锡，受到歌德的热烈欢迎。而给歌德印象最深，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恩斯特·沃尔夫冈·贝里施。他是那个时代成千个在贵族家里干活糊口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是一位在莱比锡上学的伯爵的家庭教师。他是个执拗的人，歌德后来称之为世界上脾气最古怪的怪人，但是他善于使歌德不断克制自己的忧虑和烦躁。歌德在《诗与真》里描绘道：他的外表就够特别了。瘦高个儿，健美的体型，大大地过了三十岁，鼻子很大，面部线条分明，从早到晚戴着一团假发，穿着整洁，足不出户，身旁佩剑，腋下夹着帽子……他的最大乐趣是一本正经地做些逗笑的事情，他还喜欢冥思苦想荒唐的事情。贝里施是当时那样一种年轻聪明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借口有病和轻微的怪僻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完整。他具有渊博的文学知识和准确

的鉴赏能力，很快看出了歌德这个年轻朋友的文学才华，他答应歌德用自己出众的书法为他抄写最好的诗作。他是歌德在青年时代寻求到的第一个战友。这些战友对现实和艺术的批判怀疑态度促使歌德去寻求真理。贝里施是第一个对歌德的诗歌习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贝里施曾尽全力教给歌德如何待人接物，并使他严于律己。他对歌德的帮助和劝导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歌德在《诗与真》中不无怀念地回忆道：我的诗被抄写得越漂亮越工整，我在创作时也就越勤奋，我的诗歌创作完完全全倾向于自然，倾向于真实，即使对象不是那样重要，我也努力用纯正而犀利的笔调来表现它们，特别是因为我的朋友经常促使我注意，诗歌这种东西不能用翎管笔和墨汁在荷兰纸上信手乱涂，时间、才华和工夫是珍贵的，决不能虚掷。贝里施对歌德当时以阿那克里翁体^①写的诗，虽然没有几首看得上眼，但还是把这些诗编成一部字体优美的手抄本《安为特歌集》，使其得以保存。年青的歌德当时的抒情诗质量很不稳定，除了那些在措词造句上显示抒情诗新方向的诗行之外，用当时的阿那克里翁式或伦理说教式手法写的诗歌很少有成功的。

当他的良师益友贝里施由于所谓不守规矩被贵族老爷解雇时，歌德出于义愤写了一首颂诗献给贝里施，其中几节是这样写的：

①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6—5世纪），古希腊宫廷诗人。他的诗多迎合宫廷享乐生活的需要，歌颂醇酒和爱情。后来欧洲文学中模仿他的诗体写成歌颂爱情、青春和享乐的抒情短诗，通称为阿那克里翁诗体，这种诗体在十八世纪的德国曾盛行一时。